

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爱尔兰国家身份变迁*

王展鹏 张 茜

内容提要:欧洲一体化对爱尔兰的国家身份产生了持久的深刻影响,为认识全球化、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身份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案例。爱尔兰的欧洲化进程与其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相契合,带来了国家身份在国家形态、经济模式、社会治理、对外关系维度的重大变化。英国脱欧使爱尔兰国家发展再次面临关键历史节点,有助于爱尔兰民族摆脱历史上形成的对英国的心理依赖,成为爱尔兰潜在的“宪法时刻”和国家身份进一步变迁的契机,但也显示了其在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借助“后民族国家”方案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面临的复杂挑战。就该问题开展深入的跨学科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欧洲化研究在历史制度主义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议程,而且彰显了在更广义的欧洲学和全球化研究视野下国别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爱尔兰 国家身份 欧洲化 英国脱欧 北爱尔兰问题

地区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国家身份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爱尔兰参与欧洲一体化后出现的国家身份变迁为梳理现代爱尔兰国家建构的历史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对成员国国别研究在欧洲学发展中的价值问题将提供诸多启示。

一 欧洲化与欧盟成员国的国家身份变迁

(一) 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成员国国家身份变迁问题

“国家身份”的概念来源于社会心理学集体认同的理论,是政治学关于民族国家

*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资助,是该基地 2017 年度重大项目“脱欧背景下英国与欧盟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项目编号:17JJDGJW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和民族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国家身份既是国内社会个体和群体国家认同形成的基础,也是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属性。^①历史社会学家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曾提出,共同的历史记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层面的特性是国家身份的基础。^②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一般首先表现为其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制度、主权等国家基本形态特征。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政治制度、权力的运行形式是国家保持自身的身份,并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根本原则。^③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经济社会政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国家的经济表现、福利制度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联系日趋紧密,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国家身份特征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此外,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背景下,国家身份特征的内部属性与外部属性的界限日益模糊,二者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既是先在的历史、制度、文化传统的体现,也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表现出变动不居和开放性的特征。

加入欧共体/欧盟对于大多数成员国而言都是重新界定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历史时刻,欧洲一体化影响国家政治思想和体制、政党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形式,同时也塑造着国家认同、社会共有观念、规则和规范及其制度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相对更加稳定的国家集体身份特征。同时,成员国固有的国家身份与欧洲身份之间的趋同和趋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体化对国家身份改造的结果。一般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与本国国家身份的传统和演变方向一致时,成员国能够更加主动地接受体系结构对自身身份的改造,反之则通过强化自身固有身份表现出抵抗的姿态。

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也从不同侧面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学理上的回应。米尔沃德(Alan S. Milward)在《民族国家的欧洲拯救》等著作中提出,一体化进程拯救了二战后濒临破产的西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这首先是通过产业和贸易政策的一体化实现的,而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改造则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克服激进的民族主义,增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因此,地区一体化和民族国家不是相互对立和替代,而是可以通过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的重建,达致增强国家认同的目标。^④沙普夫(Fritz W. Scharpf)等学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欧洲法律和经济一体化削弱了成员国的治理能力和民主合法性,需要成员国通过坚持和完善自身的政治经济模式特别是福利

① 参见王展鹏、夏添:《脱欧公投与英国国家身份变迁》,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87-188页。

②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enguin, 1991, p.9.

③ Ernest Barker,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98.

④ Alan S. Milward, *The European Rescue of Nation State*, Routledge, 1992, pp.3-4.

国家制度来克服一体化的挑战。^①

在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经验研究主要针对法、德、英等欧盟大国。马克森(Martin Marcussen)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法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创始成员国,历史上民族与国家具有高度的同一性,法兰西民族的优越感和在一体化之初扮演的领导者角色反而抑制了其妥协精神和灵活性。^②直到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建立,法国将欧洲联合视为实现自身大国影响力的工具,通过参与并领导一体化传播法国观念,实现了法国民族国家身份与欧洲身份的和解。尽管如此,法国的政治文化在接受欧盟超国家治理架构时仍面临很大阻力。^③德国战后国家身份改造中受欧洲一体化影响最为显著,其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形态长期不稳定,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纳粹主义一度成为国家身份的根本特征,参与一体化意味着借助与本国传统相对立的欧洲身份,实现了国家身份的重塑。而英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使其国家身份中欧洲维度的建构举步维艰,不断遭遇曲折、反复与抵抗,疑欧主义也因之成为英国国家身份的标签,最终导致英国脱欧。

欧盟中小成员国的国家身份变迁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更为复杂,呈现出多样性特征。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的经历表明,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变化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转型的方向趋同时,二者间的共振效应对国家身份产生的持久影响更为显著。而中东欧新成员国在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及其与欧盟老成员国历史经历之间的差异也带来了相互适应上的困难,使国家身份演变不断起伏、摇摆。^④

(二) 欧洲化与成员国国家身份变迁

“欧洲化”是近二十多年来欧洲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对欧洲一体化与成员国多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实践的概括。奥尔森(Johan P. Olsen)认为,“欧洲化”包含欧洲边界的变动、欧盟机构的发展、欧盟制度对成员国的影响、欧洲制度的对外输出、欧洲的政治统一等层面的内容。^⑤这一概念涵盖内容十分广泛,但其研究议程的关键部分仍是“欧盟层面的机构、身份、政策导致成员国国内核心政治和治理制度的变迁”,可以从具体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经验研究入手,探究更为长期、

^① Fritz W. Scharpf, *Governing in Europe: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

^② Martin Marcussen et al., “Constructing Europe? The Evolution of French, British and German Nation State Identiti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6, No.4, 1999, pp.614-633.

^③ Jack Hayward,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 Dilemma of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Democracy,” in Jeffrey J. Anderson, ed.,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mocrac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pp.145-146.

^④ László Flamm, “The Crisis and Eurosceptic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Europe en Formation*, No. 364, 2012, pp.305-321; Judy Batt, “European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Helen Wallace, ed., *Interlocking Dimension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p.247-262.

^⑤ Johan P. Olsen,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0, No.5, 2002, pp.921-952.

稳定的国家身份特征的变化,为研究成员国国家身份欧洲化提供一个基本框架。^①

首先,欧洲化研究路径体现了国家身份变迁在较长时段内的社会建构特征。作为欧洲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成员国对欧盟的“适应机制”是成员国学习、调适欧盟制度的过程,但这种适应不是成员国简单地接受欧盟的指令,而是面临长期的消化、吸收过程,具体可能因政策领域的差别而异,所需时间长短不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适应机制”更多体现为欧盟和成员国两种规则、规范、制度之间的竞争性选择和长期相互建构的过程。欧盟可以塑造、影响国家的法律、规范、制度,进而带来国家身份特征的欧洲化。^②在这一过程中,“适应机制”扮演了欧洲一体化和国家身份之间的传送带的角色。国际关系研究的建构主义理论,从社会建构的角度为阐释国际/地区体系结构与国家身份相互建构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工具。^③

其次,历史制度主义的欧洲化研究关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关键历史节点对成员国国家身份变迁的影响。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行为体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关键选择(关键的偶然性)的重要性,并认为其将产生持久的影响,即关键选择产生的制度、身份的路径依赖具有相对稳定性。^④他们引入“宪法时刻”的概念,提出关键历史节点具有超越一般性的利益、习惯的特征,可以建立新的规范性原则,改变政治、法律、制度结构,从而建构具有多重新属性的政治共同体及其相应的宪法制度。^⑤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家的具体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变革与国家身份的变迁借助关键历史事件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特别强调,重大外部冲击可以成为国家制度、国家根本属性变迁的关键历史节点。^⑥然而,这些关键历史节点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突变,还是所处历史条件长期演化的积累效应?这些关键节点为随后的历史进程所建立的路径依赖是长期稳定的,还是取决于行为体新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些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对认识欧洲一体化下成员国国家身份的变迁也具有启发意义。

欧洲一体化的条约制定与改革,如《罗马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斯本条

① Johan P. Olsen,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p.932.

② Ibid., pp.932-937.

③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281-292页。

④ Giovanni Capocchia and R. Daniel Kelema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Vol.59, No.3, 2007, pp.341-369.

⑤ See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Penguin Classics, 1963; Jürgen Habermas, “Why Europe Needs a Constitution,” *New Left Review*, NLR 11, September-October 2001.

⑥ Andrew P. Cortell et al., eds., *Altered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Lexington Books, 2003.

约》,成员国与欧盟关系的重要转折,如欧元的启用、欧盟东扩、英国脱欧,都曾带来成员国国家身份的转型与重塑。21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面临多重危机,特别是英国脱欧开创了成员国退出联盟的先例,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欧盟治理模式的缺陷,法德等欧盟核心国家强调欧洲主权、重建欧盟政治合法性的努力面临民粹主义的抵制,欧洲化和去欧洲化并行发展、相互博弈,都具有塑造成员国国家身份的潜力。

最后,欧洲化研究出现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转向有助于解释共同制度环境下成员国国家身份变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成员国制度和身份的差异性是欧盟制度的复杂性和政策领域发展不均衡的结果,也与民族国家自身历史建构的多样性密切相关。^①长期以来,欧洲化研究往往聚焦欧盟机构、政策对成员国法律、制度、规范、身份的改造,即采取所谓“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主要关注英、法、德等大国,成员国间的比较研究无论在规律性的学理探索还是方法论层面都存在不足。^②因而,一些学者提出,需要通过成员国“国内传统、机构、身份和资源对欧洲层面发出的信号加以解释和修正”。^③当前,欧洲一体化面临多重挑战,欧盟成员国间错综复杂的利益、观念和偏好差异凸显,“再国家化”的压力上升。关注成员国内部因素,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探讨成员国与欧盟,乃至更广义的民族国家与地区一体化、全球化关系问题,可以对民族国家面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诸多命题做出回应。

(三) 爱尔兰国家身份的欧洲化

爱尔兰历史上曾经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外族入侵,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经历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历史传统与欧洲化之间的相互适应是备受关注的问题。爱尔兰民族历史悠久,但法理意义上的现代爱尔兰国家的建立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④其国家身份在20世纪随着国家独立、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参与欧洲一体化而不断面临建构与重塑。欧洲一体化与民族国家身份变迁之间的关系是认识爱尔兰现代国家身份建构的重要线索,也对认识全球化时代地区一体化与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经验研究的案例。

^① Johan P. Olsen,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pp.932-933.

^② Helen Wallace, “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 Contrasting Experiences of EU Membership and Non-Membership,” University of Leide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ixth Daalder Lecture, 1999, p.1; quoted from Johan P. Olsen, “Organizing European 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 ... a Prelude to an Institutional Account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Helen Wallace, ed., *Interlocking Dimension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algrave, 2001, pp.323-353.

^③ Johan P. Olsen,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p.936.

^④ 爱尔兰政府将2012-2023年命名为“百年纪念季”(Decade of Centenaries)。从1912年亲英国的北爱尔兰统一派发表《厄尔斯特盟约》到1922年南北分治最终成为现实。在此十年间,爱尔兰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如复活节起义、《英爱条约》签订、自由邦建立、爱尔兰内战,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爱尔兰历史的发展进程。

爱尔兰加入欧共体加速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国家身份发生了深刻变化。爱尔兰作家麦加亨(John McGahern)曾说:“爱尔兰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她还属于19世纪,随后,她的发展几乎跨越了20世纪,进入21世纪。”^①国家身份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爱尔兰做出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抉择的结果。《罗马条约》签订后,爱尔兰开始思考加入欧共体的问题。爱尔兰财政部于1957年首次发表的国家发展规划称,解决国家经济困境的出路在于改革依靠高关税维持的保护主义经济模式,逆转严重的人口外流。它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健康发展是保证国家政治独立的前提,根本解决爱尔兰的经济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欧洲层面寻找出路。^②爱尔兰于1961年与英国共同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克服了法国否决的障碍以及各方对制造业能否经受完全开放市场冲击的疑虑,最终于1972年完成谈判,并在当年5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以83.1%的压倒性多数获得民众的支持。^③此后,欧洲一体化对爱尔兰国家形态、经济社会模式、国际角色认知等身份特征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二 爱尔兰国家身份特征的传统及其面临的挑战

学术界使用“爱尔兰性”(Irishness)的概念来讨论爱尔兰国家的身份特征,近年来从传统的历史、文化维度转向政治、经济、社会、对外政策层面。^④爱尔兰独立建国后,国家身份特征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的国家建构历程同步发展,然而,到爱尔兰1973年加入欧共体时,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仍未完成。

(一) 国家形态维度

爱尔兰国家身份在政治维度上表现出双重属性:新生的爱尔兰国家一方面致力于建立基于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公民权利保护的现代国家;^⑤另一方面,以维护民族传统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为目标,表现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爱

^① John McGahern, “The Whole World in a Community,” *The Observer*, 6 January 2002,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2/jan/06/fiction.features>.

^② Tom Gavin, *Preventing the Future: Why Was Ireland so Poor for so Long*, Gill and Macmillan, 2005, pp.115-118.

^③ “Referendum on EEC Membership 1972,” *RTE Archives*, <https://www.rte.ie/archives/2017/0427/870769-ireland-says-yes-to-europe/>.

^④ Thomas M. Wilson and Hastings Donnan, *The Anthropology of Ireland*, Routledge, 2006, p.91.

^⑤ 参见《爱尔兰宪法》第5、6、9、10条的表述。“Constitution of Ireland,” *Irish Statute Book*,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cons/en/html>.

爱尔兰于 1921 年建立自由邦,赢得了事实上的独立,但面对国家的内部争议和英国的外部压力,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仍是国家身份建构的主要内容,爱尔兰以“兄弟阋墙”的内战为代价,接受《英爱条约》、南北分治的妥协并与英国维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在政治上,亲英派仍然希望保持爱尔兰对英国的依附,留在大英帝国内部。支持《英爱条约》的务实派接受爱尔兰自治的方案,主张建立某种联邦形式的爱尔兰国家,或者实行大英帝国和爱尔兰共治的多层治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则明确提出了建立政治意义上的主权独立的爱尔兰国家方案。爱尔兰不同的建国方案之间的相互竞争与融合,决定了这一身份建构的复杂性。

内战结束后,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领导的新芬党温和派与强硬派分离,建立了共和党,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自此,共和党和统一党等主流政治力量力求在正统民族主义和国家生存与发展需求之间达到平衡。以 1937 年宪法颁布为标志,确立了基于温和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政治体制,即爱尔兰民族和国家相统一的政治实体。1949 年爱尔兰正式脱离英联邦,但民族主义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的过度膨胀抑制了现代公民国家建构的活力,与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仍然无法消除。^①

(二) 经济社会治理维度

在经济社会治理维度,爱尔兰性包含了保守的天主教义、乡村生活方式、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与贸易保护、反物质主义等内涵。20 世纪 40 年代,德瓦莱拉在国庆日演讲中对爱尔兰性做了经典的概括。他所梦想的爱尔兰国家是爱尔兰人的精神家园;爱尔兰人仅仅是将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正确生活方式的手段;他们满足于简约的生活,将闲暇的时间用于精神层面的活动。在这片土地上,田园中处处是温馨的家園,生机盎然……^②这种对传统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爱尔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取向。而在社会层面,爱尔兰沿袭英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加之保守的天主教教会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爱尔兰存在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保护妇婴的立法争论以及天主教会丑闻等社会问题。

然而,爱尔兰在独立建国后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未能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现代化道路在国家身份探索中的重要性上升,撬动了国家理念、治理形态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变革。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们常常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爱尔兰为何在建国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未能成功地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

^① Katy Hayward, *Irish Nationa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64-70.

^② Terence Brown, *Ireland: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1922-2002*, Happer Perennial, 2004, p.134.

的现代化。^①爱尔兰 1922 年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英国的 56%,到 1957 年下降为 49%; 1949-1956 年,爱尔兰国民总收入仅增长 8%,同期英国增长 21%,欧陆国家增长 40%左右。^②在这一阶段,爱尔兰人从政治独立中获得的经济红利有限,人口持续外流,经济落后于北爱尔兰的局面也未能改观。爱尔兰财政部长惠特克(Thomas Kenneth Whitaker)曾说,国家如不能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政治独立只是一块破碎的遮羞布。^③

(三)作为“他者”的英国维度

英国是爱尔兰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爱尔兰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对象,与爱尔兰国家身份的内部和外部特征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早期居民在爱尔兰的定居已有近一万年的时间,但权威历史著作记述的爱尔兰史很多始于 1169 年英国对爱尔兰的入侵,^④从此开始了两国八百多年的历史恩怨,到 16 世纪 40 年代爱尔兰已事实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并不存在法理意义上独立的爱尔兰民族国家。既是爱尔兰人又是英国人的身份困惑成为一代又一代爱尔兰人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凯伯德(Declan Kiberd)于 1995 年发出了著名的“谁创造了爱尔兰”之问,在爱尔兰学术界乃至民众中引发了激烈争论。他写道:“假如爱尔兰从未存在,那就是英国人发明了爱尔兰。”^⑤凯伯德进一步指出,爱尔兰是由爱尔兰人、英国人和海外爱尔兰移民共同创造,从山川河流的命名到风俗人情、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制度莫不如此。

尽管爱尔兰 1921 年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并最终退出英联邦,但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并未终结,产业结构仍以农牧业为主,双方签订了紧密的贸易协定。1960 年,英国在爱尔兰贸易中占比 74%;^⑥按照雅各布森(John Kurt Jacobsen)的说法,加入欧共体前,对爱尔兰人而言,“外国”就是英国,“出口”即意味着畜牧业。^⑦爱尔兰政治层面

① Tom Gavin, *Preventing the Future: Why Was Ireland so Poor for so Long*, p.8.

② Michael Hennigan, “Ireland’s National Income Per Head at 56% of Great Britain’s in 1922,” *Finfacts*, 29 March 2016, https://www.finfacts.ie/Irish_finance_news/articleDetail.php?Ireland-s-national-income-per-head-at-56-of-Great-Britain-s-in-1922-583; Also see John Kurt Jacobsen, *Chasing Progress in the Irish Republic: Ideology, Democracy, and Dependent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1.

③ Anne Chambers, “A Plan to Save the Irish Economy,” *The Irish Times*, 20 September 2014,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politics/a-plan-to-save-the-irish-economy-1.1934883>.

④ Howard B. Clarke, “Chapter 2, 1066, 1169, and All That,” in Judith Devlin and Howard B. Clarke, eds., *European Encounters*,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2003, pp.25-32.

⑤ Declan Kiberd, *Inventing Ireland*, Jonathan Cape, 1995, pp.1-9.

⑥ Jason Begley, “Ireland: A Century of Trade Relations Shows Why a Soft Border Is so Important,” *The Conversation*, 5 December 201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reland-a-century-of-trade-relations-shows-why-a-soft-border-is-so-important-88498>.

⑦ John Kurt Jacobsen, *Chasing Progress in the Irish Republic: Ideology, Democracy, and Dependent Development*, p.61.

的民族主义立场与经济层面事实上对英国的依赖相互背离,成为爱尔兰国家身份发展的内在矛盾,特别是关乎国家领土和统一的北爱尔兰问题更加剧了这一矛盾的复杂性。

(四) 领土和南北关系维度

长期以来,爱尔兰南北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既与英爱关系问题紧密相连,也是界定爱尔兰国家形态的重要维度。虽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亲英统一派之间的斗争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稳定在爱尔兰逐渐弱化,但北爱尔兰留在英国的宪法地位及其内部主要族群、宗教派别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经历了近 50 年的“敌意下的和平”和 30 年的“大混乱时期”后,1998 年《复活节协议》使北爱尔兰走上和平、和解道路,同时也在宪法制度、政党政治、民族情感、政治话语、公共舆论等层面影响着爱尔兰国家身份的变迁,特别是北爱尔兰问题的起伏、波折不断塑造着爱尔兰国家统一和南北边界问题的话语与政策走向,使爱尔兰国家不断面临主权、领土问题传统和政治经济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成为爱尔兰国家的重大宪法挑战。^①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爱尔兰政府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坚持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但在实际政策上也表现出尊重北爱尔兰现状、维持地区稳定的灵活性。在官方政治话语中,爱尔兰政府长期拒绝使用“北爱尔兰”的称谓,代之以“北方六郡”(the Six Counties),对英国则长期禁止使用“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全称,这一情况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有所改变;直至《复活节协议》达成前后,英爱两国才同意按国际惯例使用对方的国名。^② 1937 年《爱尔兰宪法》宣告爱尔兰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领土包含整个爱尔兰岛南北方 32 郡,但同时承认爱尔兰的法律只适用于南方 26 郡。^③ 到 20 世纪 60 年代,爱尔兰政府的北方政策进一步缓和,勒马斯(Seán Francis Lemass)总理不再把北爱尔兰视为“问题”,而是积极与之发展互利友好关系。1969 年后的北爱尔兰暴力冲突延缓了南北方和解进程,但并未导致其中断。

到 20 世纪 60 年代,爱尔兰面临的这些深层次挑战促使爱尔兰人重新审视自身历史,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兴起,对正统的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政治经济政策做出反思。历史学家质疑爱尔兰独立和内战的历史叙事,把独立后爱尔兰天主教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封闭的政治经济政策视为爱尔兰各种问题的根源,要求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治

^① Duncan Morrow and Jonny Byrne, “Northern Ireland: the Promise Broken?” in Gerry Hassan and Russell Gunson, eds., *Scotland, the UK and Brexit: A Guide to the Future*, Luath Press Ltd., 2017, p.150.

^② Katy Hayward, *Irish Nationa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154.

^③ “Constitution of Ireland”.

理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造。20世纪60年代,以勒马斯、林奇(Jack Lynch)为代表的共和党改革派顺应了这一潮流,推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①爱尔兰与英国达成自贸协定并共同申请加入欧共体,标志着爱尔兰接受了欧洲联合共享主权的观念,加快了其传统的国家观念的转变。爱尔兰政治精英出于遏制新芬党崛起的考虑,也与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拉开了距离,在北爱尔兰问题上一定程度地接受了历史修正主义者的立场。

三 欧共体/欧盟成员国资格与爱尔兰国家身份转型

加入欧共体/欧盟后,爱尔兰通过学习、适应新的欧洲规则、规范和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推动了国家身份的转型。

(一)加入欧共体后爱尔兰国家身份的转型

第一,加入欧共体后,爱尔兰国家身份的政治维度在注重独立、主权和民族性等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成功融入了更多相互依存和对外开放的元素,并传导到经济社会领域,带来了国家治理形态的变革。爱尔兰政治精英和民众意识到欧盟成员国资格可以加强爱尔兰国家身份的固有元素,并推动其现代化进程。不同于历史上的英国殖民主义,欧盟主权平等下的主权共享、多样性中的统一、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等原则有利于实现国家身份和欧洲身份的相互加强、共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爱尔兰保守的民族主义传统,有利于国家内部超越族群、宗教、政治等身份政治对立,并与英国在内的其他欧盟成员国建立新的共同体认同。按照爱尔兰前总理埃亨(Bertie Ahern)的说法,参与一体化使爱尔兰“通过相互依存实现了独立”。在这样的理念下,爱尔兰超越了独立的表层含义,注重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更加接近于国家真正独立的目标。曾任欧盟竞争政策委员的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也称,加入欧共体是爱尔兰人“历经艰难困苦赢得独立的终极表现形式”,也让国家走出了独立后长期无法解决的发展困境。^②

在此背景下,爱尔兰实现国家治理结构从中央集权模式向多层治理模式的演变。爱尔兰独立建国后虽采取共和制政体,但仍沿袭了英国式的单一制政体,加入欧共体时被称为欧洲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③入盟除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增加了欧洲地区

^① Kevin Whelan, "The Revisionist Debate in Ireland," *Boundary 2*, Vol.31, No.1, 2004, pp.179-205.

^② Katy Hayward, *Irish Nationa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197.

^③ Brigid Laffan and Jane O'Mahony, *Ireland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ed Globe Press, 2008, pp.133-134.

维度外,也带动了国家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爱尔兰传统治理模式中,立法权、行政决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不存在有实际权能的省与地区层级政府,城市和郡一级政府更多承担礼仪性角色,实际政策执行由更低层级的区(borough)、镇(town)政府承担。这一体制存在中央政府立法决策脱离基层民众和区镇等低层级政府专业性不足、行政效率低的双重矛盾。爱尔兰自20世纪70年代起启动了加强市、郡政府自主权的行政改革,并尝试建立地区级协调机构,通过制定《地方政府法》(1991年、2001年、2014年等)实施这一改革。在此过程中,欧盟从两个方面推动了爱尔兰中间层级政府的发展。其一,欧盟对成员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参与其法规的实施有明确要求,在结构基金、气候环境政策等涉及预算问题的欧盟政策上,区、镇一级政府在按照欧盟法规行使职能时面临专业性等方面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央政府加强郡、市政府职能,重建省级和地区政府(如芒斯特省、东南大区议会等),承担相应工作。其二,欧盟鼓励成员国地方政府在布鲁塞尔设立代表处,实现跨国政策协调。^①此外,随着爱尔兰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加强,参与全球治理也成为爱尔兰国家多层治理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欧洲一体化结束了爱尔兰在经济上对英国的过度依赖,通过贸易多元化和产业转型成功建立了新的发展模式,并使之成为国家新的身份象征。爱尔兰在产业结构上从传统农牧业立国转向具有高科技和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在爱尔兰出口中的份额从1973年的55%下降至2004年的18%。^②同时,保持制造业适度的本土化,坚持12.5%的低公司税率政策,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爱尔兰经济出现了近15年的高速增长期,1994-2000年年均GDP增速高达8.9%,2001-2002年为5.3%。按人均GDP计算,爱尔兰从入盟时的欧共体最穷国上升为欧盟第二富国,被称为“凯尔特虎”经济奇迹。^③2020年爱尔兰人均GDP7.97万美元,居世界第三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21年爱尔兰将超越瑞士上升至世界第二位。^④

社会学家鲁安(Joseph Ruane)用“对接多核心国家的外围国家发展模式”(Multiple Interface-Periphery Development Model)概括爱尔兰新的经济身份特征,即爱尔兰从

^① Mark Callanan,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Mark Callanan and Justin F. Keogan, eds., *Local Government in Ireland: Inside Out*,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3, pp.404-428.

^② Dagmar Schiek, "Brexit on the Island of Ireland: Beyond Unique Circumstances," *Northern Ireland Legal Quarterly*, Vol.69, No.3, 2018, pp.367-395.

^③ 数据参见 OECD 网站, <https://data.oecd.org>.

^④ "Projected GDP per Capita Ranking," *Statistics Times*, 17 March 2021, <https://statisticstimes.com/economy/projected-world-gdp-capita-ranking.php>.

最初与英国间的传统外围—核心国家依附型经济,逐渐实现转型,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与欧盟、英国、美国三个核心经济体实现良性互动和有效对接,同时对每个核心经济体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在这一过程中,爱尔兰不仅接受了欧盟共享主权的观念,而且充分利用更广阔的区域制度环境,化解了外围国家处于依附地位的不利因素,实现了自身经济的转型和高速增长。^①

第三,融入欧洲一体化带来了爱尔兰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爱尔兰社会政策传统上接近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天主教会在社会问题上奉行社会福利保守主义,未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②欧盟通过其规范、目标和政策工具推动了爱尔兰社会福利制度的进步性变革;马约趋同标准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爱尔兰打破经济保护主义的决心,也为社会政策的变革提供了动力。德洛尔主政欧共体委员会时期,欧盟对经济欠发成员资金支持加大,爱尔兰得到欧共体结构基金、地区基金的大量支持,1991年接受的转移支付金额达到其国民总收入的8.3%。^③自1986年起,爱尔兰借鉴欧盟经验推行社会伙伴模式,并引入开放式协调法机制,欧盟机构、国家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就工资、所得税等问题充分谈判,使爱尔兰在推行以加强财政纪律为目标的市场化转型中,稳妥处理劳资关系,推进就业政策,保持劳动力市场基本稳定。^④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给爱尔兰农牧业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提升了农业人口的福利。由于农牧业在爱尔兰经济中的占比较大,20世纪90年代经济腾飞后,爱尔兰仍长期是欧盟预算净受益国,直到2016年才成为净出资国。^⑤

随着爱尔兰法律制度的欧洲化,特别是民众观念与其他西欧国家逐渐趋同,爱尔兰在社会平等领域的天主教保守主义也出现了动摇。在性别平等方面,从1922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爱尔兰政府中没有女性部长。在公务员、教师、卫生等公共部门广泛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⑥加入欧共体之初,爱尔兰即通过《女性地位委员会报告》和《反歧视(工资)法》改变了这一状况。20世纪90年代后又先后出现了罗宾逊(Mary Robinson)和麦卡利斯(Mary Patricia McAleese)两位女性总统。作为天主教保守主义

^① Joseph Ruane, "Ireland's Multiple Interface-Periphery Development Model: Achievements and Limits," *Nordic Irish Studies*, Vol.9, 2010, pp.145-166.

^② Gerry Boucher and Gráinne Collins, "Having One's Cake and Being Eaten too: Irish Neo-liberal Corporatism,"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LXI, No.3, 2003, pp.298-230.

^③ Peter Hession, "Riding Three Horses at Once: Ireland's EU Membership as A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Renewal: A Journal of Labour Politics*, Vol.27, No.2, 2019, p.66.

^④ Ibid.

^⑤ Brigid Laffan and Ben Tonra, "Europe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in John Coakley and Michael Gallagher, eds.,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Routledge, 2012, p.309.

^⑥ Dermot Keogh, *Twentieth Century Ireland: Revolution and State Building*, Gill and Macmillan, 2005, p.287.

象征和堡垒的离婚、堕胎禁令也随之被打破。离婚、堕胎合法化的立法几经拉锯,宪法修正案最终分别于1997年和2018年在全民公投中获得批准;2015年5月的全民公投又以62%的明显多数通过了同性婚姻法。^①在教育方面,欧洲大市场的启动和教育政策的协调推动了爱尔兰教育的开放,伊拉斯谟等项目加强了爱尔兰与欧盟成员国的合作,同时在执行欧盟标准过程中,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也为爱尔兰经济起飞提供了人才保障。^②

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盟日益面临经济可持续增长困境,先后提出了卡迪夫进程(Cardiff Process)和里斯本议程,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建立平衡市场和公平关系的基于知识经济的社会发展模式,减少国家的财政压力,但批评者认为这一市场导向的改革是新自由主义的回潮,会给爱尔兰社会模式的进步性变革带来不利影响。^③

第四,《复活节协议》成为爱尔兰官方和民众普遍接受的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宪法共识,暂时放弃了在领土问题上所坚持的主权绝对性和不可分割性的宪法传统。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建立跨国治理机制、接受当地居民双重国籍等政策事实上体现了共享主权的观念,是“后民族国家”观念在国家领土、治理形式等层面对爱尔兰国家基本特征的重构。^④加入欧共体/欧盟为英国和爱尔兰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欧盟扮演着共同的制度环境提供者和担保人的角色。同时,欧洲一体化的理念和实践为相关各方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维模式。欧盟作为冷战背景下以实现和平与安全为首要目标的制度创新的地区组织,其基本理念中合作、相互依赖、谅解、地区命运共同体等观念促成了北爱尔兰问题各方搁置分歧、实现和解。北爱尔兰和平运动领袖休姆(John Hume)曾说,两次世界大战法德间规模巨大的冲突都能通过对话实现和解,北爱尔兰冲突就显得微不足道了。^⑤自1973年起,英国、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三方先后达成了《桑宁代尔协议》(1973年)、《英爱协定》(1985年)和《复活节协议》,寻求在北爱尔兰实现和平、和解的路径。在欧盟的制度框架下,《复活节协议》建立了南北委员会、英爱部长

^① “Huge Republic of Ireland Vote for Gay Marriage,” *BBC*, 23 May 2015,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2858501>.

^② Dermot Scott, “Education,” in Patrick Keatinge, ed., *Ireland and EC Membership Evaluated*,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③ David Begg, “People, Work and Social Change,” in Jim Hourihane, ed., *Ireland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Lilliput Press, 2004, pp.49–52.

^④ Richard Kearney, “Ireland and Britain—Towards a Council of the Isles,” in Robert J. Davage Jr., ed., *Ireland in the New Century: Politics, Culture and Identity*, Four Courts Press, 2003, pp.28–29, 41–42.

^⑤ Brigid Laffan and Jane O’Mahony, *Ireland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p.210–211.

理事会等合作机制,多次提及欧盟在其中的作用,在《英爱协定》中,英爱两国政府明确表示“希望进一步促进人民之间的独特关系和国家间作为欧盟内部和睦邻居与伙伴的紧密合作”。^①在此框架下,北爱尔兰大约60%的立法来自欧盟或需要与欧盟法协调;^②在与欧盟相关的政策领域内,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决策更易于达成共识,成为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重要支柱。^③协议采取协和式民主模式(Consociationalism),确保亲英的统一派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地区事务中具有相互制衡的平等权力,例如立法上双方相互拥有否决权,政府首脑(首席部长和副首席部长)须由两个群体分别派代表担任;北爱尔兰居民可自由选择拥有英国、爱尔兰或者双重国籍。^④

这些安排使北爱尔兰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总体上实现了和平与稳定。但无论是协定生效之初共和军放下武器出现的反复,政府机构悬挂国旗方式引发的风波,还是2017-2020年地区政府的停摆都显示了《复活节协议》面临的隐忧,即北爱尔兰的主要群体对该地区的未来仍怀有截然相反的目标,分权机制的运行如何加深双方互信、建立真正的地区集体认同依旧是一个现实挑战。^⑤若无法妥善应对,和平进程在内外部双重重大挑战的背景下将面临中断或逆转的风险。

第五,对外关系转型是爱尔兰“从孤立走向相互依赖”的另一领域。爱尔兰外交有着岛国的孤立主义传统。长期以来,爱尔兰“高政治”外交的重点只有两个:一是与英国的双边关系,二是通过国联和联合国多边外交维护自身独立地位。^⑥加入欧盟后,爱尔兰在欧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框架下实现了外交多元化转型:随着20世纪80-90年代成功融入全球化,爱尔兰也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国、拉美、澳大利亚等海外移民聚居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同时通过“亚洲战略”积极寻求与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爱尔兰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中立政策与欧盟安全防务一体化的深化之间的矛盾显现,新芬党等民族主义者也以此作为动员民众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理由。

^① British-Irish Council, “British Irish Agreement,” <https://www.britishirishcouncil.org/about/british-irish-agreement>.

^②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Centre: European Union Issues,” 8 April 2002, <http://archive.niassembly.gov.uk/record/reports/020408b.htm#9>.

^③ Mary C. Murph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ormal’ Politics in Northern Ireland,” *European Studies*, Vol. 28, 2010, pp.190-191.

^④ The UK Government, “The Belfast Agreement,” 10 April 1998,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36652/agreement.pdf.

^⑤ David Mitchell, “Northern Ireland: Twenty Years of Troubled Peace,” *Current History*, Vol.117, No.797, 2018, pp.89-95.

^⑥ Brigid Laffan and Jane O’Mahony, *Ireland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p.178-180.

(二) 21 世纪初爱尔兰国家身份欧洲化面临的疑欧主义挑战

爱尔兰国家身份的欧洲化改造进程也不是直线上升的,21 世纪初以来曾面临两轮疑欧主义崛起的考验。第一轮疑欧主义上升期伴随着 21 世纪初欧盟的扩大和深化而兴起,爱尔兰民众对一体化在国家主权、政策自主性、身份认同上带来影响的担忧加剧;同时,经历了“凯尔特虎”经济奇迹后,爱尔兰成为欧盟富国,从欧盟获取经济利益的需求下降;中东欧新成员国加入带来的经济成本也削弱了爱尔兰对一体化的功利主义支持。在批准《尼斯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的首轮全民公投中,爱尔兰民众两次否决条约文本,“保护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维护爱尔兰中立地位”“维护爱尔兰税收自主性”以及维护在欧盟机构中的发言权等诉求成为主要理由。^①

第二轮疑欧主义上升期则出现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凯尔特虎”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奇迹熄火,爱尔兰成为受危机打击最大的笨猪五国(PIIGS)之一。欧盟在德国的坚持下拒绝无条件提供金融救助,爱尔兰被迫接受欧盟委员会、IMF 和欧洲央行“三驾马车”制定的以强化财政纪律为附加条件的救助计划;危机和紧缩政策的叠加效应导致爱尔兰经济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引发民众不满,新芬党等派别批评欧盟剥夺爱尔兰经济主权,质疑政治精英所主张的参与一体化加强了爱尔兰政治独立的叙事。^②

尽管面临上述挑战,到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前,欧洲一体化对爱尔兰国家身份的改造达到了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在国家形态维度,加入欧共同体使爱尔兰政治精英接受了新的国家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除推进现代化和对外开放外别无其他可行的选择”,参与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民族国家的身份和自主性成为共识。^③这样,欧盟、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多层治理成为爱尔兰事实上的国家治理架构。在经济层面,爱尔兰向欧盟、英国、美国开放的多维互动发展模式经过欧债危机的冲击重新走上正轨。在社会层面,爱尔兰在社会福利、公民平等、少数群体权利等方面实现了现代化改造。在历史遗留的国家统一问题方面,爱尔兰内部接受《复活节协议》的立场成为主流声音,亲英统一派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间的身份政治有所弱化。

^① 王展鹏:《自由政府间主义及其挑战——爱尔兰与欧盟制宪进程的个案研究》,载《欧洲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52-67 页。

^② Peter Hession, “Riding Three Horses at Once: Ireland’s EU Membership as A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p.64.

^③ 爱尔兰前总理菲茨杰拉德 1982 年 6 月 5 日的演讲,转引自 Katy Hayward, *Irish Nationa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192。

四 英国脱欧变局下爱尔兰国家身份的重构压力

英国脱欧进一步改变了爱尔兰民族历史形成的对英国根深蒂固的依赖心理,成为重新界定爱尔兰国家身份的关键历史节点。英国宣布举行脱欧公投之初,爱尔兰各界对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冲击忧心忡忡,但随着脱欧进程的展开,爱尔兰人在应对脱欧挑战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从容和自信。都柏林大学教授肯尼迪(Liam Kennedy)认为,尽管充满不确定性,但英国脱欧可能会成为爱尔兰民族心理解放的又一个关键时刻,是爱尔兰民族走向成熟、自信的历史节点。^①爱尔兰国家身份在南北关系、多层治理模式以及国际角色层面的基本特征面临重构。

(一) 脱欧对北爱尔兰问题的影响与爱尔兰国家身份的重构压力

英国脱欧对爱尔兰国家身份演变的影响首先直接体现在爱尔兰南北关系维度,并对其国家身份特征产生多方面的溢出效应。英国脱欧首先对以《复活节协议》为基础的北爱尔兰治理模式构成了巨大冲击。虽然脱欧协议和《北爱尔兰问题议定书》给予北爱尔兰特殊地位,使之维持与欧盟的紧密经贸关系,但欧盟为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提供制度环境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表示,从其作为《复活节协议》主要谈判者和签订人的视角来看,该协议是建立在英国与爱尔兰同为欧盟成员国的基础之上的。^②北爱尔兰随英国在政治上脱离欧盟,动摇了这一根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亲英统一派借助欧盟公民身份维系的象征性政治认同不复存在;强硬脱欧派和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在脱欧进程中将维护英国国家主权作为最高原则和终极目标,拒绝做出妥协,削弱了各方在欧盟框架下共享主权的既有安排。在实践中,欧盟作为调节各方利益冲突的中间人以及经济资助提供者的角色也因权力关系的改变明显受到弱化。

其次,脱欧致使北爱尔兰内部政治和族群分歧加剧,身份政治回归。脱欧导致的新身份政治与传统身份政治相互交织,在北爱尔兰原有的族群、宗教分裂之外增加了欧盟身份存废的博弈维度。由于北爱尔兰民众总体上亲欧,民主统一党在地区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受到削弱。英国政府在脱欧谈判中未能充分考虑权力下放地区的权利,引

^① Liam Kennedy, "Amid Brexit Chaos, Ireland Seeks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The Conversation*, 1 February 2019,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mid-brexit-chaos-ireland-seeks-international-opportunity-110939>.

^② Vincent Boland, "Brexit Britain Will Need to Amend Good Friday Agreement, Says Blair," *Financial Times*, 12 May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46cf672e-3716-11e7-bce4-9023f8c0fd2e>.

发民众不满,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以此为理由提出启动爱尔兰统一公投的问题。特别是《复活节协议》后不复存在的南北方之间的边界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和解精神的象征,被历史学家描述为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不是体现在地图上,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①成为脱欧过程中各方博弈的焦点。

再次,脱欧协议给予北爱尔兰的特殊安排仍存在不确定性,为未来冲突留下隐患。脱欧后,北爱尔兰将在未来四年中继续适用欧洲单一市场规则,仍为欧洲经济区的一部分;但贸易上北爱尔兰属英国关税区,英国只是对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的商品代表欧盟征收关税。爱尔兰海事实上成为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边界。民主统一党以其损害英国在北爱尔兰的主权为由一直采取抵制立场。此外,脱欧后北爱尔兰失去欧盟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支持,英国政府能否有效填补资金缺口也存在变数。根据协议,北爱尔兰地方议会每四年以简单多数决定是否延长该安排,四年后协议能否继续执行仍取决于未来地区选举后北爱尔兰议会各党派的力量对比。2021年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英国按原计划执行脱欧协议北爱尔兰议定书的内容面临困难,提出延长过渡期的要求,加深了英欧之间和北爱尔兰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②

最后,英国脱欧使爱尔兰统一问题再次进入英国和爱尔兰的政治与公共话语讨论之中。与苏格兰等地区不同,《复活节协议》提供了在北爱尔兰组织公投的法理依据,即在当地多数民众支持爱尔兰统一的情况出现时,英国政府有义务组织爱尔兰统一公投。从近年来权威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利物浦大学等民调数据看,虽然北爱尔兰多数民众仍支持留在英国,但这一优势日益缩小,而一些媒体民调已得出支持统一的民众人数占优的结果。^③近年来,一些有利于爱尔兰统一的因素也在不断积聚:天主教人口增速快于新教徒,新教徒的人口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历史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北爱尔兰经济停滞不前,已明显落后于爱尔兰;脱欧后北爱尔兰安排的脆弱性可能会使一些持中间立场的民众,特别是非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考虑支持爱尔兰统一,以期获得

^① James C. Beckett, *A Short History of Ireland*, Hutchinson of London, 1977, p.192.

^② Nic Robertson, "Brexit is Just Weeks Old, And It's Already Threatening Fragile Political Stability in Northern Ireland," *CNN*, 6 February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2/06/uk/brexit-northern-ireland-violence-threat-intl/index.html>.

^③ 有关民调结果参见“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UK's Exit From the EU: What Do People Think?”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May 2018, https://www.qub.ac.uk/sites/brexitni/BrexitandtheBorder/Report/Filetoupload_820734_en.pdf; “NI General Election Survey 2019,”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February 2020, <https://www.liverpool.ac.uk/media/livacuk/research/heroimages/The-University-of-Liverpool-NI-General-Election-Survey-2019-March-20.pdf#page13>; “Political Attitudes,” Northern Ireland LIFE&TIMES, 2019, https://www.ark.ac.uk/nilt/2019/Political_Attitudes/REFUNIFY.html; “Results of A Future Border Poll on A Knife Edge 2020,” LucidTalk, 24 February 2020, <https://www.thedetail.tv/articles/a-majority-favour-a-border-poll-on-the-island-of-ireland-in-the-next-10-years>.

留在欧盟内部的地位。

虽然爱尔兰政府当前的政策仍是继续支持在《复活节协议》框架下维持北爱尔兰现状,但随着国内政治博弈加剧、统一话语的影响力增强,爱尔兰政府的审慎立场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2021年4月,北爱尔兰地区爆发了近年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与亲英派极端准军事组织有着紧密联系的犯罪团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明确喊出了反对北爱尔兰的贸易边界安排的口号。爱尔兰政府表示,对北爱尔兰可能“螺旋式倒退”到宗派冲突的担忧加剧。^①这些因素在未来都可能打破爱尔兰在统一问题上的脆弱平衡。

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是爱尔兰民族难以回避的痛苦历史记忆。爱尔兰独立战争中,面对强大的英国殖民者,爱尔兰主流政治精英被迫接受南北分治,将其作为实现独立建国目标的“阶梯”,并为此付出了惨烈内战的代价。面对北爱尔兰存在两大对立的主体族群的现实,英爱各方达成的《复活节协议》安排体现了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适度分离的“后民族”治理理念。脱欧引发的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不确定性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后民族实验成败的试金石。

(二) 英国脱欧的溢出效应与爱尔兰面临的潜在“宪法时刻”

爱尔兰国家形态的多层治理模式也受到英国脱欧传导效应的影响。爱尔兰与欧盟的关系在这一多层治理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在脱欧后爱尔兰国家身份演变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这一维度的加强对爱尔兰内部治理、欧洲和全球治理模式总体上将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脱欧进程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民众的参与度、关注度远超一般的国际和国内重大事件;传统媒体、新媒体对英国脱欧影响的讨论深度、广度空前,也形成了关于爱尔兰国家未来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1) 爱尔兰内部治理与宪法安排

一些研究者认为,爱尔兰国家未来治理模式的讨论超出了传统民族主义者的叙事,面临超越身份政治实现国家身份重大转型的窗口期,甚至具有触发潜在的“宪法时刻”的空间。托德(Jennifer Todd)认为,爱尔兰国家未来走向的三种可能是:因英国脱欧而陷入混乱,在现有框架下维持现状,实现爱尔兰的统一。这一演变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爱尔兰民众能否进一步超越传统的身份政治,建立包容的规范导向的新的国家身份,从根本上摆脱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内部以及南北方之间殖民主义的历史包

^① Michael Hirst, “NI Riots: What Is Behind the Violence in Northern Ireland?” BBC, <https://www.bbc.com/news/uk-northern-ireland-56664378>.

袱,弱化因族群和宗教冲突和现实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身份政治对立,进而实现国家身份的“进步性转型”。在他们看来,这一国家身份转型并不仅限于现实的边界或贸易安排等问题,而是利用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形成的公共领域,促成相关利益攸关方,特别是民众间的沟通和协商,在个体、群体和国家层面超越身份政治,建构平等、互利、包容的新共识,并以宪法原则的形式固定下来,实现爱尔兰民族、人民之间的真正和解。^①然而,如前文所述,“后脱欧时代”北爱尔兰问题暴露的诸多矛盾预示了这一新的爱尔兰国家身份建构方案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现实政治层面,新芬党的崛起是一个新的变量,对爱尔兰国家形态和经济社会政策的演变有着潜在的影响。爱尔兰左翼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近年来地位上升,特别是在2020年大选中,历史性地成为爱尔兰第二大党。虽然该党的选举胜利的原因更多是选民对传统主流政党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特别是住房、医疗等公共政策的不满,^②但脱欧也促使部分民众回归针对英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加速了新芬党的主流政党化进程。^③新芬党坚定推进爱尔兰统一的政策主张与共和党、统一党等主流政党的谨慎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双方的辩论推动了爱尔兰社会关于统一问题的辩论。新芬党近年来对欧政策的微妙变化也折射了爱尔兰社会心态的变迁。加入欧共体以来,新芬党从一个疑欧的激进民粹政党向温和疑欧政党演变。英国脱欧公投后,新芬党的政策注意力从欧盟本身转向爱尔兰和英国围绕脱欧的博弈,逐渐认可了主流政党所持的“欧盟在谈判中是爱尔兰利益维护者”的立场。^④新芬党议员在议会辩论中提出,如果爱尔兰政府代表南北双方的利益和欧盟一道共同保护全体爱尔兰人民,新芬党将支持政府和欧盟的政策。^⑤这些政策转变在对欧政策、南北关系、社会公正等维度对爱尔兰国家身份的演变产生了影响。

(2) 爱尔兰与欧盟关系

英国脱欧总体上加强了爱尔兰人的欧洲认同。21世纪初以来,爱尔兰一度出现疑欧主义显著上升的态势,英国脱欧后该趋势得到逆转。这既得益于爱尔兰经济复苏

^① Jennifer Todd,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dentity Change: Exogenous Shocks, Constitutional Moments and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the Island of Ireland,” *Irish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8, 2017, pp.57-72.

^② Vince Cable, “Sinn Fein’s Success at the Irish Election Will Only Grow from Here—Even If It’s Kept Out of Government,” *Independent*, 10 February 2020,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irish-election-sinn-fein-result-fine-gael-varadkar-reunification-a9327491.html>.

^③ Dan Haverty, “Will Irish Elections Lead to Unification?” *Foreign Policy*, 7 February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2/07/irish-elections-unification-brexit/>.

^④ Rory Costello, “Rally Around the EU Flag: Irish Party Positions on the EU in the Wake of Brexi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20, pp.1-17.

^⑤ *Ibid.*, p.13.

的良好表现和“凯尔特虎”模式重新获得活力,也反映了“后脱欧时代”爱尔兰面临新的国家身份选择时对欧盟的认同程度进一步加强。

在欧债危机期间,民粹主义者宣称爱尔兰是“三驾马车”主导的纾困计划的受害者,该立场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认可,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度下降。但2016年后民意数据发生了逆转:根据EMI/RED C的民调结果,2013-2018年认可爱尔兰从欧盟获益的受访者比例从83%上升到87%,认为爱尔兰应退出欧盟的从29%下降到11%。^①“欧洲晴雨表”的民调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该趋势:2013-2019年,爱尔兰民众对欧盟的支持度从80%上升为93%;欧洲身份的认可度在2015年为51%,2016年上升到57%,2019年进一步上升至67%,2019年58%的受访者承认脱欧改变了他们对欧盟的态度。^②2018年的“欧洲晴雨表”数据还显示,针对“如明天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你将如何投票”的问题,爱尔兰选择留欧的占85%,在28个成员国中占比最高,比欧盟平均值高19%。^③

爱尔兰作为受英国脱欧影响最大的欧盟成员国不得不面对爱尔兰边界问题及北爱尔兰和平进程遭受的冲击,其民众的欧洲认同总体上得到了加强。在英欧谈判中,爱尔兰与其他成员国协调立场,维护成员国间的团结,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身利益。这也得益于爱尔兰长期参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身份不断增强、经济上逐步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实现了多元化:到2017年,爱尔兰对英出口在对欧盟成员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下降至21%,德国对爱尔兰的投资已超过英国。^④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爱尔兰将成为无条件支持欧盟的“好学生”,爱尔兰在与欧盟、美国、英国之间的多元互动中仍将坚持自主性,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新芬党的疑欧立场虽有所弱化,但对欧盟经济自由主义仍持强烈的批评立场。该党认为,欧盟仍未从债务危机中吸取教训,德、法等国的政治精英将自身的一体化发展方案强加给外围国家,损害了爱尔兰的利益,加剧了贫富分化。^⑤

^① “Ireland & The EU (2013-2018),” European Movement Ireland, <https://www.europeanmovement.ie/programmes/ireland-and-the-eu-poll/>.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rometer: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index#p=1&instruments=standard&yearFrom=2013&yearTo=2021>; quoted from Rory Costello, “Rally Around the EU Flag: Irish Party Positions on the EU in the Wake of Brexit,” p.1.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rometer 20,” <https://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ResultDoc/download/DocumentKy/86481>.

^④ “Ireland Balance of Trade,” <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ireland/balance-of-trade>.

^⑤ Matt Carthy, “The European Union Must Be Radically Reformed,” 8 February 2019, <https://www.sinnfein.ie/contents/52376>.

爱尔兰作为后发国家在接受欧盟的价值、规范实现自身国家身份改造的过程中,仍坚持保留自身发展模式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部分。爱尔兰经历了“凯尔特虎”奇迹的失去与复归后更加意识到,在欧盟统一性下坚持自身特色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在税收制度问题上,爱尔兰长期以来将 12.5% 的低公司税作为国家名片,不惜被视为准避税天堂,拒绝做出调整,以此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因此与欧盟龃龉不断。^① 2016 年以来,围绕苹果等跨国公司享受事实上不足 1% 的超低税率,爱尔兰与欧盟机构进行了多轮争执乃至法律诉讼。欧盟委员会依据国家补贴规则(State Aid Rules)要求苹果公司向爱尔兰和欧盟机构补缴约 130 亿欧元的税款。爱尔兰政府支持美国跨国公司的立场,多次提起上诉,于 2020 年最终推翻了欧盟委员会的决定。^② 在数字税问题上,爱尔兰与德、法等欧盟大国的立场也存在分歧。^③

(3) 爱尔兰的全球角色维度

英国脱欧促使爱尔兰提出了扮演更加积极的全球角色的目标。爱尔兰独立后,外交政策有着孤立主义传统,在一些重大国际合作决策上往往与英国保持同步,在加入欧共体以及《申根协定》问题上都是如此。当脱欧意味着这一路径依赖难以为继时,英国公投前爱尔兰政府和民众对脱欧构成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风险感到忧虑。^④ 随着脱欧对爱尔兰的冲击趋于稳定和可控,爱尔兰人意识到,脱欧不仅在欧盟内部而且在全球层面给予了国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契机。这些有助于爱尔兰人克服历史形成的对英国的心理依赖:在政治上,英国在脱欧进程中表现出的混乱增强了爱尔兰对本国政治体制的信心;在经济上,爱尔兰成为欧盟主要英语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其对外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特别是,由于脱欧协议未能包含金融服务业安排,伦敦金融中心失去自动进入欧盟市场运作的权利,临时性准入能否持续仍存变数。加之英欧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一定差异,欧盟也希望借此机会摆脱对英国金融市场的依赖,都柏林有望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巴黎、卢森堡等城市一道成为受益者,在绿色、数字金融方面都柏林表现出一定的竞争优势,也是脱欧后接收英国金融机构迁出最多的城市。^⑤

^① Peter Hession, "Riding Three Horses at Once: Ireland's EU Membership as A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p.70.

^② "EU Court Overturns Commission Decision in Landmark Apple Tax Case," *Jones Day*, July 2020,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20/07/eu-court-overturns-commission-decision-in-landmark-apple-tax-case>.

^③ John FitzGerald, "Digital Tax Is a Price Worth Paying to Regulate Tech Monopolies," *The Irish Times*, 2 November 2018, <https://www.irishtimes.com/business/economy/john-fitzgerald-digital-tax-is-a-price-worth-paying-to-regulate-tech-monopolies-1.3682974>.

^④ Daithi O' Ceallaigh and Paul Gillespie, eds., *Britain and Europe: The Endgame*, IEA, 2015.

^⑤ John Whelan, "Brexit May Bring Windfall to Ireland'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rish Examiner*, 27 December 2020, <https://www.irishexaminer.com/opinion/columnists/arid-40197135.html>.

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下,爱尔兰提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欧盟和全球战略。爱尔兰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明确选择将对欧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并于2018年提出了“2025全球爱尔兰”战略,在欧盟和全球两个维度增强自身影响力,在欧盟决策和联合国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为此,爱尔兰政府提出扩大爱尔兰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大幅增加爱尔兰驻外使团数量,扩大对外贸易,加强文化输出与人文交流。^①同时,爱尔兰积极推进对华合作,对参与“一带一路”表现出强烈意愿,成为欧盟内部对华政策的稳健力量。2018年3月,时任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访问美国时称:“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全球性国家,不再是偏居欧陆边缘的岛国身后的孤岛,而是身处世界中央的海上枢纽。”时任爱尔兰驻美大使马尔霍尔(Dan Mulhall)也回应说:“我们终于成为爱尔兰人自己的国家。”^②

结 语

参与欧洲一体化对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而言都带来了政策、制度乃至国家身份的巨大转变,爱尔兰由于其国家历史经历的特殊性,欧洲化进程对国家身份变迁的影响尤为显著。一般认为,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等国家身份要素与一体化走向的匹配度越低,欧洲化面临的抵抗和压力越大。^③但爱尔兰的经验表明,国家身份并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当成员国自身身份的变革需求与一体化的走向相一致时,国家身份特征及其面临的变革压力可以打破既有惯性,推动其欧洲化进程。

欧洲化进程对国家身份变迁的影响主要通过塑造国家的具体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进而对更具稳定性的国家身份特征产生传导效应,其中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往往可以加速国家身份变迁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随着爱尔兰加入欧共体,国家身份的基本特征,如“德瓦莱拉”式的民族主义,天主教保守主义和反物质主义,农牧业立国、自给自足和保护主义的经济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到20世纪末形成

^① Government of Ireland, “Global Ireland: Ireland’s Global Footprint to 2025,” June 2018, <https://www.ireland.ie/media/ireland/stories/globaldiaspora/Global-Ireland-in-English.pdf>.

^② Julian Borger, “Brexit Will Strengthen Ireland-US Relations, Says Irish Ambassador,” *The Guardian*, 30 June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jun/30/brexit-will-strengthen-ireland-us-relations-irish-ambassador-daniel-mulhall>.

^③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Conceptualizing the Domestic Impact,” in Kevin Featherstone and Claudio M. Radaelli, 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7-111.

了开放、多元、富有活力、后天主教、现代的“凯尔特虎”的爱尔兰。^①欧洲一体化在促使爱尔兰国家治理的观念和政策的转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爱尔兰政治精英和民众做出的加入欧共体的选择更大程度上是国家现代化道路长期探索的结果,并非偶然。

英国脱欧的影响成为国家身份变迁的又一关键历史节点。爱尔兰成功应对脱欧带来的挑战,增强了民族自信,改变了对英国的传统心理依赖,引发了新的宪法变革的讨论,开启了国家身份进一步变革的窗口期。但其走向仍具有不确定性——面临爱尔兰南北方关系,内部党派、族群分歧,及其与欧盟、英国、美国的博弈和身份建构的挑战,也昭示了爱尔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后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复杂性。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詹姆斯(Harold James)在评价英国脱欧的原因与影响时所说:“脱欧公投在一个革命的经历如此匮乏的国家不啻是一场革命。如同其他革命一样,其结果不会迅速变得明朗起来,而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②英国脱欧最终能否成为爱尔兰国家身份变迁的新的宪法时刻,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

爱尔兰的案例也提出了在欧洲学研究,特别是在欧洲化相关研究中开展成员国国别研究、中小国家研究和比较研究的价值的问题。在爱尔兰这一具有强烈身份政治传统的国家,呈现出从身份政治博弈到国家身份变迁的转型发展的态势,^③其意义不仅在于欧洲学学理发展的层面。面对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冷战”思维导致的身份政治加剧,如何克服差异性的羁绊,在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并实现国家身份的进步性变革也是这一研究可以提供的启示。

(作者简介:王展鹏,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爱尔兰研究中心、英国研究中心教授;张茜,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Joseph Ruane, “Ireland’s Multiple Interface-Periphery Development Model: Achievements and Limits,” p. 213.

^② Harold James, “Britain and Europe: What Ways Forward?” *Economic Affairs*, Vol.37, No.1, 2017, pp.2-14.

^③ Jennifer Todd,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dentity Change: Exogenous Shocks, Constitutional Moments and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the Island of Ireland,” pp.1-16.